

## 稻景、品質與文化景觀： 池上慣行與有機稻業的交織政治\*

劉亮佑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 摘要

1997年池上「伯朗大道」及週邊景色因咖啡廣告而嶄露頭角，繼之2013年長榮航空廣告更將池上一望無際的稻景推向世界舞臺。池上平原遼闊的稻景，呈現多數媒體、觀光客及旅遊業者對池上的第一印象，儼然為池上的代名詞，更成為農村天然與浪漫想像之集大成。本文從主流稻景印象與農村現場之間的矛盾出發，試圖透過地方稻業的社經脈絡，理解農業景觀所隱喻的文化景觀意涵。

1980年代，糧政單位透過良質米產銷政策及開放國內食米自由市場，促進食米消費以解決國內因稻米外銷受阻所延伸的米糧過剩問題。1990年代，即將加入WTO引發的市場威脅，更使「良質米」成為抗衡市場壓力的利器。有機稻米便在此亟欲追求品質以立足自由市場競爭的時代推展開來，使有機米業被理解為與良質米「同樣」具「高品質、競爭力」的象徵。這條由慣行與有機交織的「精緻有機之路」，以振興國內稻米競爭力為中樞，而與以環境永續為核心的另一條有機之路雙軌前行。本文認為理解國內有機之路的腳步，需要回到本土社經脈絡中，關注其與慣行良質米業的交織關係。而臺東池上有機稻米的歷程，恰恰呈現出這條本土的「精緻有機之路」。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三個面向來掌握池上地方由慣行與有機稻業所交織的品質精進運動與精緻有機之路。首先，80-90年代，在臺灣向國際農糧體系讓步的糧政策略之下，池上在良質米產銷計畫推動過程中的位置與影響。其次，2000年後，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下，池上米追求品質與建立制度的過程中，慣行良質米與有機米在治理上的交織關係。最後是2000年開始，池上有機稻米在極力追求米質的時代推展所呈現的面貌。本文將透過上述三者的會遇，及其交織在農村社會脈絡的事實，釐清池上米業近三十多年來發展歷程中，慣行與有機稻作的交織政治及其鑲嵌在多方社經關係及農村社會等張力下的面貌。

關鍵辭：池上、稻景、良質米、有機稻米、文化景觀

\* 本文於2016年5月7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計畫主辦、臺東縣政府、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協辦「臺東客家二次移民與社會文化適應—東臺灣區域研究工作坊」，臺東：臺東縣客家文化園區。首先，感謝與談人張育銓副教授，以及與會先進們所給予的寶貴建議，並感謝本期刊匿名審查人所給予的審查與修改意見。其次，感謝本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蔡晏霖副教授亦師亦友的陪伴與指導，以及口試委員張瑋琦老師、劉志偉老師、李宜澤老師等所給予的寶貴修改建議。最後，特別感謝津和堂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於本文書寫過程中所給予的諸多支持與協助。

## 一、前 言

池上以其一望無際的稻田景致為名，1997年伯朗咖啡廣告播出之後，「伯朗大道」及其周圍景色逐漸為國人所知，繼之2013年長榮航空的廣告，在國際巨星的代言下，更將池上遼闊的稻田景觀呈現在世界面前。池上的遼闊稻景成為雲門舞集的創作題材登上了國際舞臺，更成為城市人們的療癒景觀，吸引大批的觀光客湧入地方。於是，巨星騎單車行經的小路、坐過的石頭、乘涼的大樹，都成為觀光客蜂擁朝聖的對象；甚至也有觀光客為了拍攝稻田景致，直接踐踏稻株，或是要求正在田間工作的農民，挪移其停放在路邊的機車。如今，池上平原遼闊的稻田農業景觀，呈現出多數商業、媒體、觀光客以及旅遊業者對池上的第一印象，儼然成為池上地區的代名詞。然而，這片集中了眾多外界對農村浪漫想像的「天然」景致，是否是在排除了許多的真實後所呈現的風景？

伯朗大道及天堂路周圍一帶的水稻田，在地方知識份子、地方政府及東部文史工作者們基於維護特色農業景觀的先後推動下，於2014年3月由池上鄉公所向臺東縣文化處提出文化景觀之申請，並在同年5月份登錄公告為「池上萬安老田區文化景觀」，又於2016年3月更名為「池上新開園老田區文化景觀」。池上老田區全區為175公頃，共300餘位地主。然而，藉由「文化景觀」試圖永續維護農業地景的初衷，卻同時在炙熱的觀光效應下，與各式的「文化景觀」想像相互交織與角力著。一方面，觀光人潮的大量湧入及林立於地方生活要道沿線的自行車業者，對地方的生活秩序與品質造成莫大影響。另一方面，在近年東部後山農地炒作及觀光盛行的趨勢下，池上老田區的文化景觀登錄，亦造成民眾產生諸多想像的不安全感。於是，「文化景觀」不但被部分人士認知為觀光發展的企圖；對登錄範圍內的地主而言，亦被理解為觀光問題、發展限制以

及土地貶值的元兇。當自行車業者因農地非農用的營業行為遭受縣府開處罰單，臺東縣府地政處長江清華、觀旅處長江慧卿、以及臺東縣議會副議長陳宏宗和縣議員黃瑞華等，竟有意以池上老田文化景觀區為由，建議池上鄉公所提出「興辦事業計畫」以爭取陳情業者的就地合法（聯合報 2016），使「文化景觀」又進一步演變成替利益背書的工具。池上的稻田美景、稻農安居樂業、農村天然純樸以及精緻國產食米的想像，不斷在媒體、城市街頭看板以及世界舞臺中被放大呈現；然而在這些圖像中，卻看不見快速觀光化對農村生活形成的干擾，也看不見農業景觀永續維護的願景，在觀光利益湧入的農村社會中，遭逢各方勢力交織角力的矛盾。

面對這片成為主流形象的遼闊稻景與農村現場之間存在的落差與矛盾，該如何重新理解它？而這幅農業景觀除了視覺上的特殊性之外，有何特定的社會經濟脈絡？

池上地區在日治時期即為日本殖民政府指定進口的臺灣稻米產區之一，雖然長期以來享有「貢米」美名，但池上米在國內市場的知名度一直到 1980 年代臺灣糧食政策轉向之後，才開始大幅提升。1984 年，臺美簽訂「中美食米協定」限制臺灣食米外銷總量，國內開始產生巨大的米糧倉容壓力以及資金虧損問題。於是，當時的糧食局除了消極實行水田轉作，也積極發展精緻農業，推行米質改良與小包裝行銷，並解除了既有的糧區制度，加速國內食米市場的自由化以促進食米消費。1985 年糧食局開始推廣良質米產銷計畫時，池上地區被選為東部重點輔導區域之一。於是，在政府資源、市場開放以及地方農會的積極推動之下，池上的水田種植面積不但未如臺灣西部地區受轉作政策而降低，其市場知名度更因此大幅提升。「良質米」於 1980 年代在國內開始推展，被視作臺灣因應國內食米過剩之對策；至 1990 年代後，因面臨 WTO 簽訂後即將來襲的國際市場開放壓力，更成為抗衡進口稻米的利器。

然而，「池上米」的光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卻逐漸成為全臺糧商仿冒的對象，甚至成為國內純淨良質米的代名詞，仿冒現象在 1990 年代末期最為嚴重，影響了地方糧商與農民的利益。不過，池上米的仿冒現象可說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糧食局自 80 年代實施良質米產銷政策，並透過國內食米市場的開放與競爭來促進食米消費的結果；二則促使池上在遭受仿冒之苦以及 90 年代面臨 WTO 市場開放壓力下，開展出以追求品質作為因應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的對策。

2000 年以後，池上在地方糧商建興米廠的主導之下首先正式推動有機稻米，接著「池上米產地認證」體制則延續了過去良質米產銷政策在池上的脈絡，並交織了「MOA 自然農法」的知識體系及管理方式，交揉成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及品質控制的治理模式。至於池上有機稻米在 90 年代期間的試種與 2000 年後以產銷班形式的推動，皆被賦予提升地力與作物品質並具市場競爭力等想像，成為池上良質米列車的頭等艙。有機稻米在一個亟欲建立稻米品質以對抗市場競爭的時代進入池上，並隨著池上米認證制度的建立，有機米除了被納入良質米的米質標準系統中，被賦予競爭力、高品質、高價位、穩定穀價以及池上米新出路的象徵，池上米的制度成就也間接形成對有機稻作推展的圍限。

當有機農業自 1986 年經少數官方與學界人士引進臺灣近 30 年，逐漸浮現許多反思與批判觀點之際，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探究有機農業走向科學、市場與工業邏輯窄路的本土意涵為何？國內農糧政策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又如何牽動本土有機農業的走向？本研究認為，欲檢視國內有機之路的腳步，不能忽略回到本土社會經濟脈絡中來理解，也就是有必要關注有機與慣行米業的交織關係。這是因為有機農業對於臺灣的意義，一部份固然承襲自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對工業化農業的反思，試圖為戰後長達二十多年，高度依賴現代化學式農業的臺灣，建立起維持土地及環境永續的農業生產方

式。然而另一面向，有機耕作在稻米產業中的推動，亦在不同時代的土壤中，生長出屬於臺灣本土的有機意涵。這條由慣行與有機米業所交織的本土「精緻有機之路」，是以振興國內稻米競爭力為中心考量，與以生態環境永續為核心思維的有機之路雙軌前行。而臺東池上有機稻米的推動過程，則恰恰呈現出這條本土的「精緻有機之路」。

作家劉克襄指出池上這片地景，是臺灣人的美學，是池上人的驕傲與光榮，他期盼更多地方像池上一樣，以好的種植方式讓米價提高，使農人快樂生活，而金城武離開以後，池上仍會「永續」的存在著。我們該以何種視角來看待池上稻景的「永續」面貌？如何理解其文化景觀內涵？池上地區近十年來，由慣行與有機稻業所交織的品質精進運動與精緻有機之路，是否為近年來觀光產業發展下的池上農村社會，提供了什麼樣的社經脈絡？本文以臺東池上為研究對象，試圖釐清池上地區從米質提升、有機稻米到產地認證的一連串過程中，慣行與有機稻業的交織政治及其遼闊稻景的文化景觀意涵。

## 二、全球化下的池上米質改良運動

1980年代開始，臺灣糧食政策受國際農糧體制的影響邁向新的階段，國內糧食政策的轉向與地方社會經濟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80至90年代近20年間，是池上平原米業發展的關鍵時期。這段時期池上米業的推進，不但見證了國內米糧政策的轉向，更呈現出農政單位對於當時有機稻米在臺灣推展的想像。

### （一）戰後國際農糧體制下的臺灣糧食政策

戰後國際農糧體制在美國新霸權的主導下，國際糧食的生產、流通及消費，被調整為有利於美國出口其剩餘農產品的市場結構。當時在臺灣，協助美國從生產技術及產銷組織層面，推動國內戰後農業經濟發展及農村復興工作的單位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並受美方相當程度上的經濟支援（劉志偉 2009：116；黃樹民 2013：19-20）。美國在 1950 年代開始對外傾銷小麥，並以營養健康為麵食推廣運動之主論，藉此開拓海外小麥市場，而相同策略亦運用在雜糧作物上，並於 1960 年代開始出口其國內剩餘雜糧作物（劉志偉 2009：135）。由於臺灣在戰後受惠於美國援助，因此當美方發出亟欲消耗其剩餘農產品的市場需求時，臺灣也逐漸難於違逆其主導勢力，進而退讓及調整國內既存的糧食供需體系。於是，1960 年代開始，除了作為主要糧食的稻米仍以自給自足且持續增產的方向推動之外，小麥及畜牧飼料原料皆由自給自足的立場傾向，轉為對進口糧食倚賴的政策主軸（劉志偉 2009：145-151；2011：28）。70 年代國內稻穀增產及保價收購的政策，讓臺灣稻米外銷量大增，賺取了可觀的外匯。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農政單位已意識到國內米質提升及食米消費量的重要性；不僅於 70 年代即進行水稻品種研究，以及在 80 年代初展開白米小包裝及分級銷售型態，亦於 1983 年廢除「糧區制度」打開國內食米市場流通之門（宋勳等 1988；蔡麗琴 1992；孫清義 2005；顏昌晶 1999）。不過，國內明顯展開食米品質改善及消費提升的具體行動，則是在 1984 年臺美簽訂「中美食米協定」之後開始。

國內稻米長期以來大量外銷的趨勢，嚴重影響了美國米的利益。於是，臺美在 1984 年簽訂「中美食米協定」，美國開始限制臺灣自簽訂起五年內的白米外銷總量。這項協定造成當時以產量為導

向的稻米產業出現嚴重滯銷、倉容不足及基金虧損等狀況，稻米過剩所延伸的問題，使得農糧單位意識到促進國內食米消費的必要性。於是，農政單位為求紓解稻米生產過剩的壓力，便於同年實施「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從消極面降低國內的稻米產量；又於隔年 1985 年實施「良質米產銷計畫」，從積極面將國內稻米生產導向「米質重於產量」的觀念，藉此提升國內食米的消費量。而稻米品質的提升亦具有兩個層面的減產意涵，一是在耕作技術上透過降低氮肥使用，減少稻米產量並改善食味口感，二是輔導糧商向農民加價契作高品質稻穀，透過價誘促使農民減少種植公糧稻穀，以降低國家收購公糧的財政負擔（鍾怡婷 2013：82、95）。池上地區在 1985 年也配合了政策實施稻田轉作，輔導農民第一期轉作飼料玉米，第二期維持稻作；不過由資料顯示，池上農民投入轉作的情形並不普遍，而此現象必須透過同年於池上展開的「良質米產銷計畫」來理解。

## （二）從中央到地方的米質提升運動

「良質米產銷計畫」成為國家發展精緻農業的項目之一，列入當時糧食局加速農業升級的重要措施。不過，就在農政單位展開良質米推廣之際，臺灣西部的稻米產區因為工廠林立及灌排不分的問題，開始於桃園、彰化、雲林、臺中等地陸續爆發「鎳米事件」。1980 年代末期，當西部稻米產區接連發生重金屬污染問題之際，率先聲稱「未受污染，且絕對不使用農藥」的「池上米」便贏得了消費者的擁戴（鍾怡婷 2013：121）。其實，「池上米」不僅具有日治時期進貢天皇的美名，戰後也與「西螺米」、「富里米」、「關山米」同為日本指定的外銷米；其名氣以及美味的代表，已深植國人心中，而食安問題使得未受工業污染的東部生產區，更逐漸受到國人重視。「良質米」在當時農政單位的定義中意指「在良質米適

栽區，種植推薦的良質米品種，所生產的稻穀、糙米、白米均經檢驗合於標準者」。良質米適栽區規劃一直以來以西部雲林、彰化等地為大宗，不過從 1990 及 1997 年資料顯示，臺東縣卻是全國良質米實際種植達成率最高的縣市（江瑞拱 2005：55-56）。池上在國內良質米產銷計畫中，不但成為臺東良質米適栽區的規劃要地，經由臺東農改場規劃的池上良質米適栽面積，亦幾乎等於池上稻米的實際種植面積。良質米的推展對於池上地區的稻米經濟具有關鍵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後續進一步探討有機稻米在此地的推動情形，不可忽略米質提升政策的發展脈絡。

池上鄉自 1985 年第 2 期稻作起，即開始配合中央辦理「良質米產銷計畫」，由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簡稱臺東農改場）擔任技術指導，池上鄉農會執行契作措施。<sup>1</sup>該計畫在 1980 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是糧政單位面臨稻米外銷受阻及食米消費降低所造成的稻米過剩危機，必須透過良質米推動來提升稻米品質，藉此促進國內食米消費市場。於是，農政單位便從品種研究、適栽區規劃、良質米標誌及小包裝及市場分級等面向，逐一展開「良質米」米質提升運動。到了 90 年代，臺灣積極爭取加入 GATT，展開一連串國際協議談判（唐淑華、蕭佟瓊 2012）。我國面對國際稻米即將開放進口的趨勢，進一步將「良質米」的推廣視為國家抗衡國際市場壓力的重點工作。於是，米質提升運動在 1990 年代，不僅延續 80 年代活絡食米消費市場及紓緩稻米過剩危機的角色，更進一步成為臺灣穩固其國際農

---

<sup>1</sup> 值得一提的是，農會的角色便由早期作為國家公糧業務的窗口，進一步被納入國內稻米自由市場的競爭中扮演政策執行者，並受國家資金扶植成為良質稻米產品的提供者；包含補助其建設一貫作業的現代化碾米廠，強化農會收購自營糧的能力，及給予銷售通路優惠，以降低政府公糧收購的財政壓力。然而，國家為促進稻米產品商品化及自由市場流通所立的一系列制度，雖使得市場結構轉型，卻也鬆動既有利益結構，惡化國家與民間糧商的關係，且強化國家政策推動對農會體系的倚賴。市場結構的轉變，形成農會與民間糧商的競爭，進而引發糧商自願投注資本追求品質的提升（鍾怡婷 2013：103-105）。在池上米的推動過程中，農會與民間糧商之間亦呈現出官方投注及民間資本的競爭關係。



糧體系位置的重要利器。90 年代後的米質提升運動，則透過 CAS 良質米認證及稻米品質競賽<sup>2</sup>，也進一步從國家標準賦予良質米法律上的位置，於 1995 年設立「CNS 國家標準」並挑選全臺五個鄉鎮試辦稻穀加價收購，藉由增加種植收益刺激農民生產，其中試辦點之一即包含池上地區（中國時報，1995a，1995c）。

### （三）有機良質米的出現

當國內亟欲促進食米消費，以及面臨未來國際稻米市場開放，進而積極推行米質改良運動之際，同時也是有機農業開始在臺灣推廣的時期。於是，有機農業在臺灣的推展，固然源自少數官方與學界人士，承襲歐美及日本等國反思工業化農業的論述，試圖為戰後高度倚賴現代化學式農業的臺灣，建立起維持土地及生態環境永續的農業生產方式，但也在臺灣本土脈絡中，被理解為一種「高品質」與「競爭力」的象徵。有機農業早期在臺灣的發跡，深受日本「MOA 自然農法」的影響（謝慶芳、白坤山 1993），並可從對土壤改良的層面見其關聯。此外，國內農業雜誌《鄉間小路》也開始刊載系列文章，指出施用有機質肥料具有提高地力及作物品質的益處（圖 1），強調發展永續農業以及生產有機農產，是臺灣加入 GATT 之後，國內面對國際稻米開放進口的有效策略（黃伯恩 1994：55）。在農政單位的推動下，臺東農改場在 1993 年便與池上鄉公所合作進行 3 年的試種實驗，同年，地方糧商建興米廠也展開了有機稻米的試作。

---

<sup>2</sup> 糧食局更為了強化生產者對米質提升的觀念，在 1991 年 3 月舉辦首屆良質米「金米獎」選拔賽。這項選拔賽是針對已接受良質米產銷輔導，並與農戶製作生產的農會及廠商為對象，就其產品選拔出優勝前十名頒發獎盃予以表揚，目的在於促進農會及廠商提升其工廠的設備及品管。池上鄉農會即在該年第一屆的良質米競賽中，獲選為「金米獎」得主之一，且為花東地區唯一的獲獎廠商（聯合報，1991a，1991b）。池上鄉農會在農糧署輔導下，自 1995 年舉辦首屆池上鄉稻米品質競賽。並持續在一連串的縣級、花東級與全國等一連串比賽中頻頻得獎。密集的得獎紀錄，呈現池上對政府政策的配合，也展現出池上對稻米品質的提升及市場知名度的確立相當積極投入。



【圖 1】《鄉間小路》1994 年 4 月號（左）及 5 月號（右）雜誌中，提倡多施有機質肥料有助提高農作物品質以及農田地力的廣告宣傳。

於是，「有機良質米」的概念在此時期出現，認為發展有機農業以提高稻米品質，將是我國加入 GATT 後，面對產業衝擊的因應之道。當時在臺東地區的農政相關單位皆指出，配合臺東良質米規劃區栽培良質米品種，並且以有機農法耕作的「有機良質米」是為本區之發展重點。而在良質米市場競爭激烈的情勢下，提供消費市場東部無汙染且健康的「有機良質米」，將良質米提升到最高境界，是強化本區產業競爭力的可行方法（黃明得<sup>3</sup>1994；張德興、楊昌隆 1996；吳清吉<sup>4</sup>1996）。90 年代「有機良質米」此一說法，應與國內有機農業法規較晚發展有關，因此當有機農業於 2003 年確立其法律位置後，該詞則幾乎不再使用。然而，在許多農政單位對於有機農業的論述上，依舊可見良質米概念交揉其中；也就是說，良質米品種與栽培方式，以及衡量良質米品質的標準（容重量、食味值、完整率），也同樣運用在有機稻米的品種、栽培及品質衡量上（丁文彥、黃秋蘭、江瑞拱 2008：2-8）。「有機稻米」對當時的臺灣而言，不僅止於維繫土地及生態環境永續的目的。它從臺灣時代土壤中所

<sup>3</sup> 前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場長，任期 1993-2007。

<sup>4</sup> 前池上鄉農會總幹事。

長出的「品質」及「競爭力」之意義，是當時國內面對全球市場壓力時，繼「良質米」更進階的利器；也是地方區域面對國內激烈的食米市場競爭時，藉此提升其市場競爭力的途徑。

80 到 90 年代，座落在花東縱谷中的臺東池上平原，在戰後國際農糧體制新勢力的替換下，為因應國內糧食政策的轉向，始終作為農政單位推動良質米相關計畫的實驗與示範場域，而非水田轉作政策下的減產處境。而池上農會在這段時期，除了積極爭取市場知名度以外，也扮演了國家政策配合及執行的角色。90 年代中期，有機稻米在此力求米質提升的時代，於池上地區展開官方與民間的試種計畫，並且被理解為一種可提高農田地力、提升農作物品質、以及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出路，成為池上良質米列車的頭等艙。池上米業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發展，正足以說明臺灣米質改良的歷程，以及有機稻米在臺灣時代土壤中，開始長出屬於本土的「品質」及「競爭力」意涵。

### 三、池上慣行與有機的交織政治

90 年代末，池上米在池農過去努力的經營下，開始遭受嚴重仿冒，此一處境映照出戰後臺灣米糧政策的實施策略，也啟動了地方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極力追求品質高峰的路程。2000 年後，「產地認證」的推動具體呈現了全球、國家與地方社會等社經關係的交織過程。這套成為地方米業主流治理模式的「產地認證」體系，其實延續過去從中央到地方的良質米運動，並且交織了「MOA 知識體系」的管理方式，重新編組成專業化、標準化及品質控制的主流制度，使池上米得以立足國內外自由市場的競爭之中。

### （一）承先啟後的仿冒現象

在國內良質米市場開放之初，池上米雖具有日治時期的「貢米」美名，但其名氣尚未超越當時的濁水米。不過，在國家資源的挹注以及池上農會的積極性，池上米於 90 年代初期獲得全國良質米「金米獎」，因此打開其市場知名度。然而，隨著池上米市場名氣的提升，「池上米」不但成為優良品種以及東部無汙染良質米的代名詞，更成為當時國內糧商業者爭相仿冒的對象。90 年代末期猖獗的仿冒現象所具有的社會意涵，即在臺灣向國際農糧體系讓步後，國內在國際壓力下的自保策略，是透過米質提升及開放食米市場，藉由市場競爭來促進食米消費以舒緩 80 年代米糧過剩的問題以及 90 年代國外進口稻米的衝擊。而「池上米」則在眾多的美名與光環，以及這場激烈且缺乏管理機制的市場競爭中，質變為純淨品種且富有競爭力的代名詞，成為全國業者爭相仿冒的對象。

於是，90 年代末期，池上地區除了飽受仿冒現象所困，也同時面臨臺灣即將加入 WTO 的市場開放壓力。此時追求「品質」以提升國內農產「競爭力」的農糧發展論述，不但成為池上化解自身產銷困境的思路，更藉由產地認證的品牌運動，來保障池上米的地域識別。2000 年後，在由地方知識分子及民間糧商資本的主要投入之下，一條由有機稻米知識體系、本土良質米產銷知識以及地方社會脈絡交揉而成的池上米獨立之路開始啟程。

### （二）日本 MOA 自然農法的啟示

2000 年以後的池上米新制，以「產地認證」標章及其相應的管理機制為核心，並在歷經各方社經關係的角力下，將這套制度推向池上米業治理模式的主流。不過，這一整套「池上米產地認證」的制度系統，包含分級收購、食味值檢測、栽培記錄、米質競賽、教育訓練、產銷專區製作、產地標章等等，並非獨創於個人或地區。

事實上，這套制度是由本土「良質米產銷制度」及日本「MOA 知識體系」相互交揉下的產物。更進一步來說，池上於 1980-90 年代在當時糧食局、農改場、鄉公所及地方農會的努力下，許多良質米產銷政策諸如米質競賽、分級加價收購、簽約契作、CAS 良質米認證、有機良質米等措施，都在池上有過推動的痕跡。「池上米產地認證」便是延續良質米產銷政策在池上的脈絡，並交織了「MOA 知識體系」的管理方式，重新編織成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及品質控制的市場邏輯治理模式。

「自然農法」的概念最早在 1935 年由日本岡田茂吉提出。<sup>5</sup>岡田茂吉受啟示以救世為己任，從原屬日本神道教分支的「大本教」獨立，創立「大日本觀音教會」，同年提出「自然農法」概念。1950 年，岡田茂吉重組「大日本觀音教會」為「世界救世教」，推廣「岡田式淨化療法」、「自然農法」、「美術文化」等三大事業（瞿海源、章英華 2002；倪禮豐 2007）<sup>6</sup>。1980 年川合輝明創立了 MOA<sup>7</sup>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 MOA），開始透過設立研究中心、制定執行基準、政治結盟、國際組織等面向，具有系統性的推展岡田茂吉的理想（漢聲出版社 1996b）。1982 年大仁實驗農場成立，這座農場是 MOA 自然農法的中央研究農場，擔任自然農法研發、教育以及栽培展示的角色，也是各方人士前來參訪見習的據點（漢聲出版社

---

<sup>5</sup> 雖然 1938 年在日本另有福岡正信提出的「自然農法」概念，但其概念較受歐美採納。由於日本國內的自然農法以岡田茂吉的理論為主流，而台灣自然農法的發展也承襲此脈絡，因此，本研究將以岡田茂吉的自然農法理論為主要討論對象。

<sup>6</sup> 1970 年，「世紀救世教」的分裂達到最高峰。在小山秀美子的帶領之下，原屬「世界救世教」分會的「東京秀明會」獨立出來創立了「神慈秀明會」，除了仍尊岡田茂吉為教祖，也依循其教義推廣「淨靈」、「自然農法」及「美術」三大領域（瞿海源、章英華 2002）。往後，在「神慈秀明會」的脈絡下推展的自然農法則稱「秀明自然農法」，至於自然農法延續「世界救世教」的「自然農法普及會」而推展者稱為「MOA 自然農法」。由於池上是受到「MOA 自然農法」的影響來推廣有機稻作，因此本文則以此支脈為主，闡述該農法在日本地區的發展。

<sup>7</sup> MOA=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

1996a)。1990年以後，MOA以提高世界性的環境保護、農業資訊交流、人類健康為旨，開始積極在國際間進行推廣，並於1991年和美國學者共同籌劃成立「財團法人世界永續農業協會」(WSAA)。

「世界救世教」及其分支「神慈秀明會」皆尊岡田茂吉為教祖，是二次戰後興起的日本新宗教。日本新宗教的產生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為掌握政權，將日本神道教設為國教，確立天皇為中心的皇國體制。二戰後，此結合天皇崇拜與軍國主義的體制被打破，戰前高漲的日本民族主義在國際制約下相對消沈。然而，民族主義意識早已深根日本民心。戰後日本政教分離的政策，促進了新宗教的發展。新宗教基於生存需求傾向保守右派，一面藉由政治結盟來穩固教團位置，一面則透過招喚民族主義來爭取信徒。於是，在新宗教愛國主義運動之下，日本中心論及民族優越論等民族主義思潮再度活躍而起(邵宏偉 2008a)。岡田茂吉所創立的「世界救世教」也具有右派傾向以及政治結盟的現象；在此宗教思想脈絡下，MOA自然農法在日本的推展亦與政治有著密切結盟的關係(邵宏偉 2008b)。總言之，「MOA自然農法」在因其宗教與政治脈絡的支持，大量信徒不僅成為農場志工，亦成為穩固消費群，使其在日本國內具有系統性的運作(倪禮豐 2007)。

「MOA自然農法」在臺灣推展時的宗教成分並不濃厚，然而在引進之初，則搭上了臺灣這班由中央至地方行駛前進的有機農業列車。「MOA自然農法」宛如宣教般從日本向世界各地的組織與政府單位傳播，並在1989年經由一位當時在臺日關係間扮演重要角色的謝森展先生，因此引進臺灣。此外，1970年代臺日正式斷絕邦交以後，便是透過「民間機構」持續維持雙邊的經貿文化關係。1990年成立的美育基金會以及1993年在MOA金援下集結產官學三方人脈成立的臺灣分會(CSAA)，皆以推動日本「MOA自然農法」為己任，扮演臺日兩國文化交流與親善合作的角色(漢聲出版社 1996b)。另一方面，1994年MOA修改「MOA自然農法執行基準」，臺灣便

以此基準為藍本，繼之於 1996 年由美育基金會修訂為「MOA 自然農法執行基準（臺灣版）」；而此基準又進一步成為 1997 年中央訂定的「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基金會也在 2000 年率先成為國內官方授權的有機農業驗證單位。

不過，究竟為何日本的「MOA 知識體系」會在 1980 年代末，國內農業專家也向美國有機農業取經之際，率先在國內糧政與農業技術單位中，獲得國家政策上的位置，並組織化為產官學組合的規模？本文認為，「MOA 知識體系」以「土壤改良」工作為核心，藉以提高農作物「品質」之論述（黃伯恩 1994；林俊義 2005；倪禮豐 2007）：「永續農業雖然不求產量的增加，卻著重於品質的提升，藉提高農產品的品質來換取更高的商品價值，以此增加農民的收入。永續農業使用安全的有機質肥料來改善農產品質...」（陳吉村 1995：5）是使得「MOA 知識體系」的全球傳播，得以在 1980-1990 年代，農政單位極力追求稻米品質以立足國內外自由市場衝擊的時代中，與臺灣農糧政策脈絡順利接枝的關鍵之一。

「MOA 自然農法」與池上的關聯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3 年，當時有機農業在臺灣剛展開推動，深受日本「MOA 自然農法」的影響；而其首重土壤改良的核心精神，也因著 WTO 市場開放的產業衝擊，在臺灣發展出施用有機肥料以提高地力與作物品質的自救論述，「有機良質米」的概念在此出現。而視此為發展重點的臺東農改場，更認為以有機農法栽培良質米，是提升良質米境界並強化東部米業競爭力的可行辦法。於是，臺東農改場開始與鄉公所合作為期三年的試種計畫，而當時地方糧商建興米廠也同步展開有機稻米的試作。2000 年，建興米廠負責人梁正賢老闆更赴日參訪日本 MOA 的實驗農場，並借用了日本經驗，於池上展開產地認證與社區型有機栽培的推動。隔年，池上的有機稻作便順應臺灣有機農業的推動脈絡，並以當時首先在臺灣推展的「MOA 自然農法」為驗證基準，由建興米廠為主力開始在池上萬安社區推動契作。

### （三）交揉的制度

2000 年代，在池上農會、建興米廠、池潭源流協進會以及鄉公所的先後投入下，池上孕生出一套為地方稻米產業量身打造的制度體系。制度主軸簡單來講，即為爭取「產地認證」，並以「分級加價收購」的方式來激勵農民種稻；其次，配合「全面契作」、從鄉內到全國的「米質競賽」、農民「教育訓練」等等措施，朝向「瘋狂追求品質」<sup>8</sup>的目標前進。制度推動者期望如此一來杜絕層出不窮的仿冒問題，二來在面對 WTO 開放國際市場的衝擊下，能突破當時糧食局保價收購的侷限，讓池上穀價上漲，也讓池上農民與米廠受惠。而這套由地方政府、農會、糧商、地方社團、以及農民「聯手打造」的地方制度及運作過程，一部分來自「MOA 知識體系」中「對人、對地、對農產品」針對此三方面進行認證的基本管理方式。另一部分，1980-90 年代國內良質米運動下所建構的「分級加價收購」<sup>9</sup>、「米質競賽」、「簽約契作」等概念，則成為制度中「對農產品」的認證標準。「池上米產地認證制度」便是在這兩種知識系統的揉合下，所訂定的管理方式（表 1）。

---

<sup>8</sup> 「瘋狂追求品質」一詞，取自《池上米證明標章教育訓練研討會會議講義》第一梯次，2003 年 5 月 16-18 日，由池潭源流協進會主辦，池上鄉公所、池農、池上米共同品牌協會協辦。

<sup>9</sup> 稻穀分級收購的標準，採用日本研發的「食味計」來測量糙米的食味值。「食味計」在 1980 年代由日本開發，是一種透過光譜分析來檢測米粒中諸如蛋白質及直鏈性澱粉等化學成分含量，並綜合這些成分含量換算為「食味值」的儀器；當「食味值」越高則米粒等級越高。這項儀器在 1990 年代以後，開始成為國內各農改場進行米粒食味選拔的指標。因此在 1998 年至 2006 年間，國內的良質米選拔標準，除了檢視米粒外觀之外，也以米粒的食味值作為依據（楊嘉凌等 2013；陳一心 1996）。而池上地區則是在 2002 年第 1 期開始推動「共同品牌」契作時，便引進了「食味計」來檢測米粒的「食味值」，並依據此數值將稻穀分為三等級進行加價收購。若稻穀品質未達最低等級，就不得申請產地認證標章，或者說米廠就不會以提高的價格向該農民收購稻穀。



2002年池上鄉內六間米廠包含池上農會、建興米廠、陳協和米廠、錦和米廠、廣興米廠及瑞豐米廠等地方糧商，共同出資合作籌組「共同品牌協會」推出「多力米」品牌，並在該年第一期稻作開始與農民簽約契作。「共同品牌」之名，寓含了時局下地方稻米業者們欲聯合起來的企圖；而其核心目標，即為打造一個具有產地標示精神的品牌，並且研擬一套為池上米業量身訂做的制度體系。2003年初，「共同品牌」結合當時以池上大波池環境議題起家的地方社團「池潭源流協進會」（以下簡稱池潭），基於池上米產地認證的推動計畫，開始積極研擬一套池上的米業管理制度。約在該年的中下旬，他們訂定了〈池潭源流協進會『池上米』認證標章管理規範〉及〈臺東縣池上鄉公所鄉徽使用辦法『農產類-稻米』執行要點〉兩項草案。前者以農民為對象訂定，後者則針對欲申請鄉公所授權的單位（即池潭）訂定。這兩項執行基準草案，是「本土米質提升」概念及「MOA知識體系」的揉合，也成為自2004年開始，鄉公所從池潭接手產地認證工作以後，擬定〈池上鄉公所『池上米』註冊證明標章使用執行要點〉之雛形。

【表 1】〈池潭源流協進會『池上米』認證標章管理規範〉的概念分析

概念	MOA 自然農法執行基準（臺灣版）驗證流程	池潭源流協進會『池上米』認證標章管理規範
對人	需修畢美育基金會舉辦為期三天的研習，包含 MOA 自然農法理念、MOA 自然農法執行基準（臺灣版）及堆肥製作等課程。	需完成「稻米生產技術研習班」為期三天滿 18 小時（即一梯次）的研習。包含 MOA 認證簡介、米質提升技術、池上米共同品牌全面推動計畫及認證工作說明、米王技術分享等課程。
	加入美育基金會贊助會員	加入池潭贊助會員
對地	美育基金會派檢定員至農家驗土、驗水、農家使用資材、並調查農地栽培環境及區域。通過者進行農地認定（分「MOA 移行栽培農地登錄」及「MOA 自然農法農地準認定」兩種）。	池上鄉行政轄區內農地生產的水稻
		2001-2002 年「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有案之申請農戶
栽培記錄	栽培記錄是生產者在栽培過程中施行自然農法執行基準的記錄，並且證明農產品來自健康土壤所生產。	需填寫「田間栽培紀錄簿」
對農產品	農產品標章之張貼標準： 【MOA 移行栽培標誌】農地登錄經 6 個月後生產之農作物。 【MOA 自然農法轉換期標誌】農地準認定後 6 個月～3 年之間生產的農作物。 【MOA 自然農法標誌】農地準認定經 3 年後生產的農作物。	稻穀品質最低標準：CNS 二等，食味值 65 分以上
		稻穀分級加價收購等級： 【頂級】CNS 一等，食味值 85 分以上(市價加 200 元) 【優級】CNS 一等，食味值 75 分以上(市價加 150 元) 【良級】CNS 二等，食味值 65 分以上(市價加 100 元)
收費	農友需繳交會員費，及驗證費用	農友需繳交會員費，及認證費用每期 650 元／公頃

資料來源：《池上米證明標章教育訓練研討會會議講義》第四梯次，2003 年 10 月 17-19 日，由池潭源流協進會主辦，池上鄉公所及池農協辦。

備註：1、稻穀品質未達最低標準不得申請標章  
2、「市價」指臺東縣稻穀收購價格

2002 年至 2003 年的共同品牌時期，由建興米廠與池潭所推動的這套「池上米產地認證制度」，其目標即試圖在當時的市場需求下，設計一套能讓池上米業產量穩定、品質好、安全性高、亦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至於這套制度的運作狀況，在 2003 年底共同品牌時代結束以前，其契作水田僅有 65 公頃。不過，至 2005 年農委會

農糧署推動「稻米產銷專業區」後，池上稻農與在地糧商契作的面積則開始逐漸增加（表 2）。

【表 2】池上地區各米廠契作面積消長表及佔種植面積之比例

	池農	建興米廠	陳協和米廠	總契作面積
2008	1169	465	337	1971
2009	1242	644	336	2222
2010	1260	900	476	2636
2012	960	900	408	2268
2013	960	920	439	2319
2014	1000	940	455	2395

單位：公頃（兩期作總和面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2008-2014 稻米產銷專業區企劃案／營運主體表

這項政策的目的是，輔導國內優良稻米產區中有行銷能力的糧商或農民團體，整合產區內的稻農、育苗業者及碾米加工業者，建立「稻米產銷專業區」以擴大經營規模、強化品牌行銷及提高農民收益。產銷專區規定參與的稻農不得繳交公糧，而是由營運主體依品種跟農民契作收購，收購價格則依照各地區行情由營運主體自訂（農糧署 2009）。「稻米產銷專業區」的建置可以說將過去的良質米產銷計畫，推向一個更具規模、緊密的產銷網絡。因著稻農簽訂契約的規模擴大，過去農民在收成交穀時，基於收購價格高低遊走各家米廠之間的情況逐漸減少；農民與米廠在契約之下關係越加緊密，而產銷專區也更朝向專業分工、標準化、規模化及品質控制的市場邏輯發展。

2009 年以後，池上水田與在地糧商契作的面積，佔水稻總種植面積近八成的比例，「池上米產地認證制度」成為地方稻米經濟的主流，池上的稻穀收購價格也位居花東地區之冠。

值得一提的是，池上三大米廠（池上農會、建興米廠、陳協和米廠）在每期稻穀收割前會共聚協商各家米廠的稻穀收購價，如此一來透過內部業者的集體定價，削減內部收購市場的自由競爭，藉

由整體提升地方穀價來面對外部的臺灣米業市場。此一現象顯示，池上米穀價居高的現象，並非僅單純反應稻米品質良好的層面，尚需考量其外部消費市場的影響力。在臺灣西部地區，其穀價具有與當地糧商勢力成反比的現象，例如嘉義縣穀價屬全臺最低之現象，與該縣糧商市場壟斷勢力有密切關係。然而，池上地區的糧商勢力並不衰弱，但為何其穀價卻能提升至全臺最高？本研究認為，池上糧商意識到內部收購市場自由競爭對自身的不利性，因此採取在收購價格上統一的模式並且配合契作制度的實施，建構池上內部收購市場的壟斷勢力。同時，又因為池上米的美名與地理標章的加持，使得池上米在消費金字塔的尖端占有相當的市場需求，外部消費市場的影響力亦間接促使了地方穀價的提升，如此一來增加地方生產者與業者的集體利益，二來也強化池上米的內部收購。簡言之，影響池上穀價的力量並非僅有內部收購市場的勢力，左右池上穀價的因素還包含了外部消費市場的影響力。

#### （四）主流制度中的農民視界

池上米藉由地域品牌以高質高價之居，立足於國內米業市場，其背後具有相當的地方社會經濟秩序為基礎。對池上絕大部分的稻農而言，加入產銷班參與契作儼然形成一種地方社會的潛規則，農民雖然在收購市場中的自由擇價空間受到限制，卻也在生產風險的層面獲得保障。

「你一定要參加產銷班才有這個福利，不然大家也不參加產銷班，綁手綁腳啊！...成立產銷班的目的就是，如果這一期米質比較好，別的糧商來高價一點收購你就交給他，但這邊的福利你又享受，那這些糧商不就傻瓜一樣。所以他就是要綁你，時間到了你就要交，收比較不好一點他還是要收，他要負這個責任啊...其實這種簽約方式也沒有帶什麼法律責任，你不交給糧商他也沒轍，但你會被排除

在外，沒有人敢跟你契作，你會變成一個『黑戶』，就要概括承受其他風險...」（2013.01.30 宗輝訪談逐字稿）

由此可見，維持這套地方社會秩序運作的工具，並非透過實際具有法律效益的契約文件，而是藉由輿論及人際網絡等社會關係的制約，以維持限制與保障間的張力平衡。

產地認證制度中，另一項核心機制為分級收購制度。分級收購自 1996 年在糧食局的策動下，輔導池農於池上地區試辦，針對符合 CNS 一等規格的稻穀加價收購。2002 年之後，由地方糧商聯合發起的「共同品牌」契作計畫，開始引進日系的米質評鑑儀器「食味計」作為分級收購的標準。至今，池上農民的稻穀收購價便是依據「容重量」<sup>10</sup>、「完整粒」<sup>11</sup>、「食味值」這三項分數來決定稻穀的等級與價格（表 3）。在分級收購制度的運作下，池上農民種植水稻的過程有如考試拚高分，評分機制即依此三項分數，並以其中最低者決定稻穀規格等級與收購價格。

---

<sup>10</sup> CNS 稻米詞彙「容重量」：1L 容量之稻穀重量

<sup>11</sup> CNS 稻米詞彙「完整粒」：外觀完整，透明度高且充實飽滿之米粒，包含活青米（米粒之表皮雖仍殘留葉綠素，但透明度高且充實良好者）

【表 3】池上鄉農會 105 年 2 期契作稻穀收購價格表

池上鄉農會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 105 年 2 期稻穀收購價格表 (池上米 R 認證契作戶)					單位：元	
品種	規格等級			繳交乾穀收購價格 (每百台斤)	繳交濕穀補助烘乾費 30 元/60 公斤	說明
	容重量 g/l	食味值	糙米完整粒			
有機穀	認證滿三年以上 容重量 580g/l 以上	經農藥檢測未通過者依非契作戶收購		2,300	30	一、需取得池上米 R 證明印章 二、申請池上米 R 證明印章需準備以下文件： (1)稻穀農藥殘留檢測合格證明。 (2)稻穀磅單。 (3)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 (4)稻穀栽培紀錄簿。 (5)印章。 三、未繳交以上資料者，扣 50 元/60 公斤 四、未通過農藥殘留檢測標準者拒收。 五、105 年 2 期稻作參加、TGA 驗證，農友契作品種：台穗 2 號、高雄 139 號、高雄 145 號、高雄 147 號、台農糯 73 號、越光。 六、每公頃收購標準：6600 公斤。 七、發芽率達 3% 以上者，扣 120 元/每百台斤 八、稻穀農藥殘留檢測合格證明單請於繳交稻穀時一併繳交
TGAP 契作品種台穗 2 號、高雄 147 號，經農藥殘留 311 項檢驗，N.D 者，1780 元/60 公斤。未 N.D 者依品質規格結價。				1,780	30	
TGAP 越光米	不分規格			2,500	0	
台穗 2 號	610 以上	73 分以上	80% 以上	1780	30	
高雄 139	591-609	66-72 分	70-79%	1720	30	
高雄 145	581-590	65 分	65-69%	1660	30	
高雄 147	540-580	60-64 分	60-64%	1600	30	
容重量 539g 以下減價標準以 CNS 一等白米成品率換算 (以此類推白米成品率每少 1% 減 20 元/百台斤)	白米成品率		收購價 (百台斤/元)	非契作面積農友之稻穀價格		
	63%-65%		1550	容重量 580g/l 以上	1600	
	62%-62.99%		1530	容重量 540-579g/l	1550	
	61%-61.99%		1510	容重量 539g/l 以下，以白米成品率議價		
60%-60.99%		1490				

不過，農民雖對於評分制度的門檻及不確定性有所質疑，卻又難以脫離結構體制，甚而在言談之中，可見農民將此制度視為一種個人成就的追求。對金鳳姐而言，過去池上米的制度尚未建立以前，農民自行選擇米廠繳售稻穀的情形，有如賭博一般毫無掌握與努力的目標；在當前的體制下，農民只要用心就可以獲得高價，而米質競賽的成就不但是一種激勵，對她而言更成為家庭及社會位置轉換的籌碼，

「我們池上開始有比賽以後，你很用心的話就可以拿到高價位，你很懶惰就拿到低價位，他（指米廠）現在是用這個...那個時候跟我爸爸說我要比賽，他講說，如果妳去比賽有得名，我頭就給妳...。然後我就跟他說，爸爸怎麼樣？我第二名耶！...後來我就是因為陸續都有得獎，所以我就說，以後我做什麼要按我自己的方法，順便把他(種田)的觀念導正...要跟他改變這個，就是拿一個籌碼就對了啦！」（2013.09.03 金鳳姐訪談逐字稿）<sup>12</sup>

<sup>12</sup> 金鳳姐訪談資料的提供，感謝台灣農村陣線「2013 年夏耘二階訪調池上組」的幾位夥伴：陳柏帆、廖芷瑩、吳瑞芳、簡維萱、林樂昕、蔡晏霖。

池上農民投入於契作收購、米質分數與穀價、稻米競賽及技術精進，形塑出一種池上農民的榮譽感，以及與糧商「並肩作戰」的情操，

「池上米擺在我們手裡，每一個人都要守本分，就是我們要團結！你可以去插別種嗎？不可以！為什麼？你會去破壞你的口感。所以每一個農民每期要受教育，...，不然池上你要種什麼？你要改什麼農產品？為了池上米，要團結，要受訓，要求上進，這就是責任！」（2012.08.13 旺伯訪談逐字稿）

不過，上述的榮譽感並非農民觀點的全貌，也有農民不認同現行契作收購模式裡，糧商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選擇脫離主流產銷制度，自創品牌行銷。另一方面，透過池上阿美族人的經驗陳述，也呈現出另一個面向的社會面貌，

「池上阿美族跟別的地方不同，那個經濟方面啦，競爭力蠻強的，就是會很拚...就是去拚那個最高品質，最高價錢的阿，或是拚比賽得獎金，都希望是這樣子，這對農民來講真的是不無小補阿...所以我會講『機械貧窮』就是這樣，惡性循環，你不種田也不是阿，還有什麼技能？」（2013.09.23 秀姨訪談逐字稿）

談話中所提及的「機械貧窮」指涉農民透過投資農耕設備來擴大耕作規模及收益，然而卻不斷陷入貸款、勞動及規模經濟的循環當中。馬克思提出以資本累積為目的的生產，最後造成了自相矛盾的結果。機械化的發展雖擴大了生產力，使人類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另一方面，人類也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張，反受到機械及市場規律的支配，陷入勞動與借貸的泥淖裡。

本小節透過農民在產銷結構中的實作觀點，試圖在團結、上進、責任與榮譽感等主流的池上農民印象之外，呈現產業結構由不同的行動者所構成，及其多元與交織的觀點面貌。

#### 四、池上的精緻有機之路

2003 年農委會公告相關有機規範後，我國有機法規才算正式起步。隨有機米的定義與生產逐漸具有法律上的位置，90 年代浮現的「有機良質米」此一用語已不復見。不過上至農政單位下至地方糧商，對有機米品質的想像，仍交織著良質米的影子，並試圖呈現有機米在良質米米質評鑑標準中不落人後的現象。只是，這種對於有機米品質的「精緻想像」，顯然與當前消費者對於有機農作就是外觀不好看，但是較新鮮安全及友善環境的「品質」概念相互矛盾。本文認為，這個現象所呈現的訊息是，有機農業在臺灣是以多軌的路徑推動展開。這條與本土米質提升脈絡交織前行的「精緻有機之路」，被賦予「品質」與「競爭力」的象徵，與以生態環境永續為考量的另一條有機之路雙軌前行。而池上有機稻米的推動歷程，則恰恰呈現出此一「精緻有機」的推動面貌。

臺灣有機農業早期在國內推動，日本「MOA 自然農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該農法對於土壤改良的重視，因著當時國內 WTO 市場開放所受到的產業衝擊，農政單位便在此時代脈絡中，發展出以施用有機肥料進行土壤改良，有助提高地力與作物品質的一套自救論述。池上地區在 1980-90 年代期間，因國內米質提升及市場開放等政策，飽受全國糧商的仿冒問題，國內市場的壓力，加上國外市場開放的衝擊，亦使得池上從鄉公所、農會到民間糧商極力尋找池上米業的自保之道。而由於池上地區一直以來從便在國家農糧政策的推動上，扮演示範性的角色，因此也就承襲了自農政單位發展而來的「精緻有機」論述，使得推廣有機農業成為當時池上米業推動的「新趨勢」。



### （一）地方的精緻有機想像

池上有機稻作的推展嚴格來說，是自 2001 年第 2 期作成立「萬安社區有機米產銷班」，以「大地有機米」為品牌，比前述「共同品牌」的契作時間早一期作展開。至於其推展過程中的「精緻想像」，則可透過種植區位的選址、高價位的設定以及高品質的認定等面向呈現出來。

首先，種植區域選擇池上平原東隅靠海岸山脈山腳的區塊，其關鍵原因在於先天環境條件對稻米「品質」影響的考量。由於這一帶的土壤具有黏度高且土層厚的特性，有機質較為豐富，使得地力也較為豐沛，長久以來在此生長的稻穀皆較為大顆飽滿，品質與口感良好。該區域屬於池上的「老田區」，是 1980-90 年代期間，池上農會配合糧食局在地方上推動米質提升計畫的良質米產區，更是長期以來，被地方上視為能夠生產高品質稻米且較易得獎的生產區域。換句話說，池上有機米選擇在以往慣行稻作的「資優」生產區域推動，呈現有機米在池上展開之際，被賦予一種「高品質」的期待以及產品定位。

其次，池上有機米的精緻意涵也呈現在收購價格的層面。在推動之初，池上稻穀市價僅為 1000 元／百臺斤左右時，有機米的收購價即高達 1800 元／百臺斤。此外，為了激勵士氣，僅隔一年收購價又再度提高，以通過三年轉型期的 2100 元／百臺斤來向農民收購。當時慣行與有機稻穀價差高達 800-1000 元的現象，在許多農民看來，皆認為以此「利誘」的方式促使農民投入有機稻米栽培，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除此之外，有機米的收購也一度套用了慣行良質米的分級收購標準，以此管控生產品質。而糧商將高價收購有機稻穀的成本轉嫁於市場消費價格，透過提升整體利益，藉此將池上有機稻米定位成高價位的新產品，呈現出相當濃厚的市場導向。

不僅如此，隨著池上米認證制度的建構，那些用於檢測良質米品質的標準，也被使用在有機米上，例如全國的有機米評鑑借用良質米米質標準來評比，而地方糧商建興米廠也將有機米拿去參加良質米競賽（梁正賢 2005；聯合報 2005c）。有機米被納入良質米的米質標準系統的現象，充分顯示出一條由中央政府到地方社會的本土有機脈絡，並試圖證明有機米在品質上是與良質米並駕齊驅，並同樣具有競爭力的優質農產品。

然而，上述地方對於有機米品質的「精緻想像」，顯然與當前消費者認知有機就是外觀欠佳，但較安全健康及友善環境的「品質」概念相矛盾。本文認為，此現象所呈現的訊息是，池上在面對仿冒問題及 WTO 開放進口等國內外市場壓力下，藉由追求高品質與高價位的產品定位為對策，而池上有機稻米在這個時期的推動，並非單純是基於對永續生態環境的關懷。確切的說，有機農業在臺灣以多軌的路徑展開；這條與本土米質提升脈絡交織前行的「精緻有機之路」，被賦予「品質」與「競爭力」的象徵，與以生態環境永續為考量的另一條有機之路雙軌前行。精緻有機的發展對在地推動者而言，不但符合地方經濟局勢所需，更能藉此從品質、形象及制度示範性上，提升地方稻米經濟以及米業者與農民的收益。

## （二）價差縮減及有機圍限

池上有機稻作的推展，不可忽略它與慣行良質米產銷體系的關係，這是因為有機農其實並非與慣行生產相斥，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池上有機農也同時生產慣行稻米。因此，本文認為理解有機稻作在池上的發展，有必要同時關注它在慣行良質米生產大環境中的推動情形，其中「價差縮減」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2002 年時，當時參與共同品牌契作的農民還不多，池上普遍的慣行稻穀收購價僅 1000 元／百臺斤左右；而當時有機稻穀最高已達

2100 元／百臺斤的高價。有機稻穀的「利誘」策略，成功使有機耕作面積與契作人數在 2003 年以後快速成長。到了 2005 年池上水稻專業區建立後，不交公糧改參與水稻專區契作的農民增多，而隨產地認證制度的建制及法律位置的確立，慣行良質米的契作穀價大幅提升，至 2013 第 2 期作最高已達 1650 元／百臺斤以上；然而同期有機稻穀僅提升至 2200 元／百臺斤。也就是說，十幾年下來，慣行稻穀與有機稻穀的收購價差縮減了一半左右。而這個「價差縮減」的現象，也逐漸降低了農民的種植意願，並認為種慣行良質米可以賣這麼不錯的價錢，那何必辛苦拼有機？

阿水伯曾是有機班成員後來因故退出，他指出，「現在有機和慣行也沒有差很多，才差 5、600 塊而已...那時候是因為一直鼓勵，說價格好，說 1 甲地可以收 1 萬斤，1 包有 2000 多，好管理什麼的...而且那時候一開始價格高比較沒想到辛苦，後來做下去發現不是這樣，1 甲才收六、七成而已...。」（2012.09.22 阿水伯訪談現場筆記）

阿新也曾是有機班成員後來因故退出。他認為，「現在種有機和種慣行其實利潤沒有差了，有機收 2100，慣行平均收 1500，池上這邊是米價最高的，...，雖然有機收購價高，但現在很多東西都漲價了，算一算和慣行也沒差了...」（2012.08.16 阿新訪談現場筆記）

也就是說，有機稻作的耕種過程不止打田、插秧及割稻等代耕費用高漲，秧苗單價、有機肥料及人力工資也跟著調升。此外，有機稻米基於加工過程需與慣行稻作區隔，因此農民一律繳交濕穀給米廠，由米廠進行烘乾，而無法像慣行稻米可先送至烘乾費較低的私人烘乾廠，將稻穀烘乾後再繳交乾穀至米廠。換句話說，雖然有機稻穀收購價略有提高，但因有機稻農的生產成本亦不斷增加，使得有機農的收益並未明顯隨收購價的提升而增加。不僅如此，「池上米」產地認證與分級收購制度的推動，使慣行良質米的穀價在近

十年內大幅提升，導致有機稻米的種植收益與慣行稻米收益的差距，開始在近五年左右明顯縮限。

「表 4」及「表 5」即表示，2001 年由建興米廠所製作的農民收益分析表中，有機與慣行的收益差距為 35,000 元左右。然而，至 2016 年的訪談資料中，有機與慣行的收益差距卻縮減為 11,000 元左右。在「圖 2」中，我進一步將「表 4」及「表 5」的成本，換算成一包 100 臺斤稻穀的成本，來理解 2001 年及 2016 年每包稻穀的「價差縮減」關係。

【表 4】2001 年第 2 期龍谷有機產銷班成員阿龍之收益分析表

項目	自然農法 (1.9 甲)	慣行農法 (1.2 甲)
整地 (機械)	9000 元/甲×1.9 甲=17,100 元	9000 元/甲×1.2 甲=10,800 元
基肥 (工資)	2000 元/甲×1.9 甲=3,800 元	1000 元/甲×1.2 甲=1,200 元
秧苗	28 元/片×300 片×1.9 甲=15,960 元	28 元/片×300 片×1.2 甲=10,080 元
插秧 (機械)	5000 元/甲×1.9 甲=9,500 元	5000 元/甲×1.2 甲=6,000 元
除草 (工資)	1000 元/人工×20 天=20,000 元	除草劑：60 元/包×10 包=600 元
追肥 (工資)	1000 元/人工×3 天=3,000 元	1000 元/人工×1.5 天=1,500 元
肥料	有機肥：70,210 元	化肥：8,600 元
割稻 (機械)	9000 元/甲×1.9 甲=17,100 元	9000 元/甲×1.2 甲=10,800 元
巡田 (工資)	10000 元/甲×1.9 甲=19,000 元	10000 元/甲×1.2 甲=12,000 元
打藥	0 元	10,410 元
烘乾 (缺)	(缺)	(缺)
地租 (缺)	(缺)	(缺)
成本總計	175,670 元 175670 元÷1.9 甲=92,458 元(1 甲)	71,990 元 71990 元÷1.2 甲=59,991 元(1 甲)
收入總計	11088 公斤 (換算 1 甲收穫 9726 臺斤) ×30 元=332,640 元	6110 公斤 (換算 1 甲收穫 8485 臺斤) ×21 元=128310 元
利潤	156,970 元 156970 元÷1.9 甲=82,615 元/甲	56,320 元 56320 元÷1.2 甲=46,933 元/甲
利潤差距	82615-46933=35,682 元/甲	

資料來源：池上建興碾米工廠

「圖 2」中「1-4」號的「利潤消長」箭頭線，要表達在十年前每包有機稻穀的利潤大於慣行稻穀很多（2>1 號）<sup>13</sup>，但十多年之後，有機與慣行的利潤差距則明顯縮小了（4>3 號）<sup>14</sup>。而「5-8」的「成本及收購消長」粗線，則是要表達經過十年以後，每包有機稻穀的成本漲幅比慣行高（5<7 號），但是有機的收購價漲幅卻明顯低於慣行（6>8 號）。

在此必須要說明的是，2001 年以單一農民為例的收益分析表，並未把地租及乾燥費用算入，換句話說，實際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在 2016 年本研究整理的收益表中，便加入了這兩項成本。這是因為，從鄉公所的資料中顯示（池上鄉公所 2007：52、2013：52），2001 年在池上農戶中有 6 成以上的「半自耕農」，

---

<sup>13</sup> 「2」：1,150 元 > 「1」：293 元。

2001 年每包有機穀成本算法：175,670 元 ÷ 1.9 甲 = 92,458 元。92,458 元 ÷ 9726 台斤 × 100 台斤 = 950 元。2001 年每包慣行穀成本算法：71,990 元 ÷ 1.2 甲 = 59,991 元。59,991 元 ÷ 8486 台斤 × 100 台斤 = 707 元。

<sup>14</sup> 「4」：402 元 > 「3」：228 元。

2013 年每包有機稻穀成本算法：161,850 元 ÷ 9000 台斤 × 100 台斤 = 1,798 元。2013 年每包慣行稻穀成本算法：137,200 元 ÷ 10000 台斤 × 100 台斤 = 1,372 元。

【表 5】2016 年池上農民之有機與慣行生產成本及收益綜合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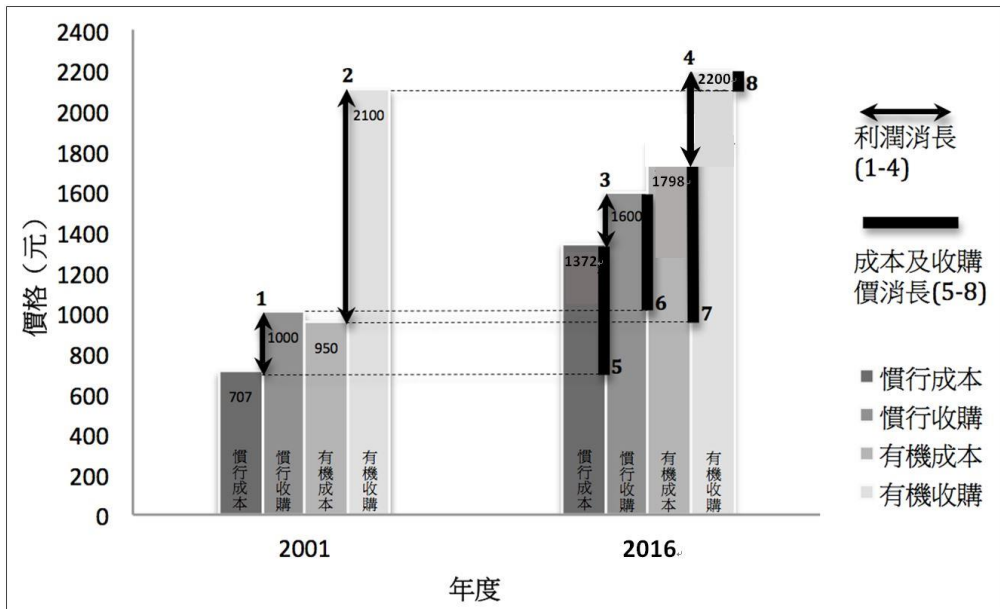
有機稻作 (1 甲)		慣行稻作 (1 甲)	
項目	單價×數量=合計 (元)	項目	單價×數量=合計 (元)
整地 (機械)	13000 元×1 次=13,000 元	整地 (機械)	13000 元×1 次=13,000 元
基肥 (工資)	2000 元/日×1 日=2,000 元	基肥 (工資)	1200 元×1 人=1,200 元
秧苗	49 元×250 片=12,250 元	秧苗	35 元×250 元=8,750 元
插秧 (機械)	6000 元×1 次=6,000 元	插秧 (機械)	6000 元×1 次=6,000 元
除草 (工資)	田間 1500 元/日×8 日=12,000 元 田埂 1800 元/日×2 日=3,600 元	除草 (工資)	田埂 1800 元×1 次=1,800 元
追肥 (工資)	1000 元/日×1 日=1,000 元	追肥 (工資)	1000 元/日×1 日=1,000 元
穗肥 (工資)	1000 元/日×1 日=1,000 元	穗肥 (工資)	1000 元/日×1 日=1,000 元
有機肥	220 元×150 包=33,000 元	化肥	(基肥)420 元×10 包=4,200 元 (追肥)370 元×5 包=1,850 元 (穗肥)430 元×5 包=2,150 元
割稻 (機械)	11000 元×1 次=11,000 元	割稻 (機械)	11000 元×1 次=11,000 元
巡田 (工資)	共 10,000 元	巡田 (工資)	共 10,000 元
打藥	—	打藥 (資材)	(除草)175 元×10 包=1,750 元 (穗肥前)3000 元×1 次=3,000 元 (穗肥後)6000 元×1 次=6,000 元 (出穗後)4000 元×1 次=4,000 元
	—	打藥 (工資)	(穗肥前)2500 元/日×1 日=2,500 元 (穗肥後)2500 元/日×1 日=2,500 元 (出穗後)2500 元/日×1 日=2,500 元
烘乾(濕穀)	12000 元×1 次=12,000 元	烘乾(乾穀)	8000 元×1 次=8,000 元
地租	45000 元×1 期=45,000 元	地租	45000 元×1 期=45,000 元
成本總計	161,850 元	成本總計	137,200 元
收入總計	9000 臺斤×22 元 (臺斤) = 198,000 元	收入總計	10000 臺斤×16 元 (臺斤) =160,000 元
利潤	36,150 元	利潤	22,800 元
利潤差距	36150-22800=11,350 元		

資料來源：2016 年本研究田野期間訪談資料 製表：本研究

也就是說有六成以上的農民並非在自有土地上耕種；至於 2010 年的資料也有 6 成的半自耕農戶人口。於是，在 2016 年的資料中，一來是加入地租等成本，二來是普遍生產成本的增加，農民種植有機稻的收益狀況，顯然已不如當初，而且有機成本與收購價的抬高也相當不成比例 (7>8)。反觀慣行稻穀，雖然這十年來的利潤差異不大 (1、3 比較)，但慣行的成本與收購價卻以相當的幅度向上提升 (5、6 比較)。

在此本文欲表達，有機農其實與慣行生產並非互斥，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池上有機農也同時生產慣行稻米。本文認為，在「價差

縮減」的處境下，有機農的利潤受到相當程度的壓縮，而這勢必對池上有機農在生產情形及資材使用上造成影響。



【圖 2】每包 100 臺斤稻穀之價差縮減示意圖（本研究製圖）

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銀川及大地有機米被驗出農藥殘留的事件之後，於中國時報刊登了一篇社論，相當關鍵的指出國內農業政策與農村脈絡脫鉤的問題。該文提及，臺灣農業政策向來把農業視為一種產業經營，而與農村社會系統切割開來。農業的推動是透過農政單位、農改場、學術機構、農會以及產銷班所組成的產業系統，忽略了農村社會系統才是維繫農業存在之所在。換言之，臺灣的農業政策倚靠理性的產業系統，不知轉化農村社會的力量成為農業轉型的助力，以至於面對農民非關理性的人性與心理問題則束手無策（中國時報 2007d）。不過，本研究認為，有機稻米在池上地區逐步推展與接受的過程，其實無法與地方的族群社會肌理脫鉤；此外，有機米產業推展之初與社區營造的結合、有機村規劃、消費者與生產者平臺的建置、合作經濟藍圖、社區生態課程的開設，甚至地景

維護行動等，皆展現了在農業產業系統推展之際，池上地區嘗試從農村社會系統試圖展開的支持力量。

確切的說，池上有機稻米的推動，實為延續國內農業政策以產業系統為主的脈絡，並且與地方農村社會系統密切連結。進一步在羅桂美論文中所言，有機農民在產銷過程中，並不如想像中充分自主，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仍深嵌在傳統慣行稻作商品生產的分工體系中；此外，有機農民除了在經濟上面臨農業轉軌的結構壓力，在政治上亦缺乏中央政策對於攸關農業轉型發展應有的投注（羅桂美 2008：161-162）。於是，面對有機米的高生產成本，使得農民須以集體化生產來分攤認證成本，並因既存的生產風險，難以脫離傳統的契作收購體系，因此也難以建立起另類的產銷合作平臺。

## 五、結論：一望無際的稻田文化景觀

本研究試圖透過池上經驗指出，當前國內針對有機農業推動趨向工業邏輯的反省與「有機慣行化」現象的論述，必須回到本土脈絡中來理解其社會意涵。這個本土脈絡指出，受到國際農糧體系的局勢轉變，國內稻米外銷受阻而引發倉容不足與基金虧損之困，中央便針對稻米這項主要糧食作物提出「品質提升」為對策，並透過國內食米自由市場的開放，來提高食米的內銷量。而隨後又受 WTO 國外市場開放的影響，於是稻米的「品質提升」政策又進一步成為抗衡進口食米的利器。有機農業的概念同樣在此時期傳入臺灣，而日系的「MOA 自然農法」知識體系因其首重「土壤改良」可提升作物品質的論點，因此與國內農糧政策接軌，成為由上而下推動有機農業的知識路徑。於是，有機稻米便在此脈絡下發展出與良質米同樣具有「高品質與競爭力」的精緻意涵，並與另一條關注生態環境永續為核心價值的有機論點雙軌併行。而池上地區由於一直以來，從米質改良到有機農業的推動，皆在國家農業推動的產業系統當中



扮演示範性角色，當然亦不可忽略地方上以糧商為首的社會經濟秩序，於是使得池上有機農業的推進與上述前者所稱的精緻意涵接壤。因此，藉由上述本土脈絡以及池上經驗的理解，本研究認為，當前對於「慣行化有機」的反思，亦不可忽略由本土脈絡發展而出的「精緻有機」此一層面來探討。而唯有回到本土脈絡中，釐清慣行與有機之間的發展關係，更進一步透過此視角進入地方，始能理解池上地區慣行與有機稻業的交織推展，並得以掌握有機生產鑲嵌在慣行生產體系中的結構處境。

不僅如此，池上地區慣行與有機稻業的交織推展在本土脈絡中發展而出，實為地方重要的社會經濟肌理，並因此形成了此地水稻產業與一望無際的稻田景觀，成為這個地方社經秩序的最佳象徵。本研究將進一步對於目前的回顧與研析作為地方社經秩序的基礎，透過人類學的地景視角，來闡述池上一望無際稻景的文化景觀內涵。

池上伯朗大道及天堂路周圍一帶的水稻田，在廣告、媒體、藝術創作等面向的推波助瀾之下，已成為國內外當紅的知名景點。2014年3月，池上鄉公所向臺東縣文化處提出文化景觀之申請，並於同年5月份登錄公告「池上萬安老田區文化景觀」，於2016年3月又由鄉公所提議，更名為「池上新開園老田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的登錄本基於對地方農業景觀的永續維護，然而在同時與蓬勃的觀光效應並行之下，各種對於文化景觀不同的想像則相互交織與角力著。因此，本文認為對於池上稻景的文化景觀內涵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如此，才能掌握「文化景觀」的保存對象與核心價值。

在人類學對於「地景」的觀點中，Eric Hirsch 認為傳統的地景觀點受到藝術性的視覺再現所影響，將農村地方認知為一種固定不變且獨立的印象。然而，地景並非靜態與固定的對象，而是隨著日常生活與社會潛能不停變動。Hirsch 指出地景的「前景」意指日常生活脈絡以及非反身經驗的理解；而「後端」則是超越日常生活經

驗的脈絡和形式。他認為任何文化脈絡中，人類會試圖把存於「背景」的潛能實現在「前景」，在這兩者之間擺盪不定；「地景」即是在這兩者相互交會的張力中，所展現的一種動態文化過程（Hirsch 1995：2-5；Feld, Basso 1996：6；方怡潔 2003：20）。

於是，再回頭觀看這片一望無際的水稻田，這幅圖像的「前景」可以理解成是這片引人入勝的稻景，是氣候、土壤、水圳、地勢、秧苗、農機，以及人與自然共作下歷代變遷的稻田景觀等元素。

池上平原由數個沖積扇構成，並因縱谷兩側山脈不同的地質條件，使得平原沖積土壤的分布狀況有所差異。平原西側中央山脈的片岩碎屑經溪流沖刷為新武呂溪沖積扇及龍泉溪沖積扇，所佔平原面積最大，其土壤性質為石礫土，排水性強較不利水稻生長。而平原東側的大坡溪沖積扇、錦園溪沖積扇、萬安溪沖積扇及富興河階等地形，則是由海岸山脈沖積土所構成，其土壤性質為黏質壤土，自清代以來即為水稻生長品質良好的種植區，亦即今日所稱的「老田區」，其扇頂亦為池上聚落最早形成之處。池上平原的構成除了地質與土壤的差異外，更受池上斷層影響深遠。池上斷層屬於逆向斷層，平原地形在斷層活動下，斷層東側上盤抬升，造成新武呂溪沖積扇端地勢較為低窪。在斷層對地勢的影響下，扇端湧泉及地表逕流匯集成大波池，也形成今日伯朗大道一帶田區有湧泉冒出及雨後積水的現象。此外，縱谷兩側山勢與地形之構成也影響了池上平原的氣溫、雨量及日照。平原的日溫差及年溫差均較鄰近鄉鎮高，日照量也較少。池上平原在地質、土壤、斷層、水文及氣候等元素下，為池上米的生長環境，建構出獨特的自然環境條件。而自然環境條件又與歷代移民在其間的開墾過程、水稻經濟及農村發展，有著密切交織的動態關係（黃瑞茂 2015：133）。

清代池上平原在平埔族及阿美族的共同開拓下，由於新武呂溪不定時常氾濫，加上平原西側土質多為石礫土，相較下東側沖積扇

之地質較適合開墾；於是，水田及聚落皆分布於海岸山脈沖積扇一帶，形成大坡、新開園及萬安等主要聚落。光緒年間清廷開墾後山時，大抵延續當時的聚落分布駐紮軍營。在清廷開始招募大陸及本島墾民後，始有漢人移墾池上平原。清末至日治初期，池上平原的開墾規模僅於新開園圳以東的海岸山脈沖積扇，聚落位於沖積扇頂，而水田則介於圳道與聚落之間。日治中期以後，新開園圳以東的土地幾乎已墾為水田，聚落的分佈開始向新開園圳以西延伸；而鐵路的建設亦使得池上平原的活動中心逐漸移往火車站一帶，形成池上平原的新集點。而大量本島西部移民則主要於日治後期湧入池上平原。地方俗稱的「老田」，概指日治時期新開園圳（今池上大圳）以東，自慶豐、新開園、萬安至富興一帶所開墾的水田。至於今日伯朗大道一帶，在日治時期則是輕便車道的通路。其周圍一帶田區在地人俗稱「肚底」，因位於新武呂溪沖積扇端，加上池上斷層活動抬升地形，使得周圍一帶地勢低窪，時而積水，時而冒出湧泉。由於住戶苦於生活不便陸續於日治結束後遷出，使得「肚底」一帶近四、五十年來皆維持水稻田景觀（黃瑞茂 2015：171）。

至於池上稻景的「後景」，則是與其緊密連結的國家農業產業推動系統，及其富有濃厚市場邏輯的經濟秩序，是臺灣在全球化下試圖立足國內外市場衝擊的隱喻，以及國家農業政策通過地方社經肌理的動態面貌。

當臺灣農業政策因應國際農糧體系的轉向而採取退讓及調整之際，池上地區也因著市場機制的變動，而必須面對猖獗的仿冒問題以及 WTO 開放進口的國內外市場壓力。於是，在食米政策上追求高價位與高品質的產品定位以立足市場衝擊，不僅成為國內農業政策之方向，也成為東臺灣池上地區地方米業的經濟對策，並因此發展出產地認證的機制。此時，有機農業在臺灣本土米質提升的脈絡中推動，不僅是基於對永續生態環境的關懷，它也在國內從農政單位、農改場到農會、民間糧商及農改場所組成的產業系統裡，被理解為

面對國內外市場衝擊時具有「品質」與「競爭力」的利器。池上地區的有機稻米在以米質提升為軸的地方社經脈絡中展開，並且在種植區域、產品價位及品質追求等層面，皆呈現出地方對有機稻米的「精緻想像」。對地方推動者而言，有機稻米的推動不但符合地方經濟局勢所需，更藉此從稻米品質、有機制度借用、產業與社區結盟之形象上，提振地方稻米經濟制度以及米廠業者與農民之收益。不過，農業產業的經營，勢必無法與它所在的農村社會脈絡脫鉤，而農民在制度中的表述也是理解支配權力面貌的最佳側寫。本文基於有限的篇幅，僅針對近三十年來，國內由農政單位、農改場到農會、民間糧商及農改場所組成的產業系統，從制度層面釐清其農業政策推動與地方米業經濟之關係。

然而，上述「前景」與「後景」具有交互作用的關係，並藉由農民日常的勞動實作過程，將國家農業產業經濟推動的邏輯，與時代下臺灣試圖立足國內外市場衝擊，於地方形塑的米業經濟秩序，透過勞動地景來實踐，亦具體藉由稻景而呈現。也就是說，原先屬於「後景」的社會結構，在勞動經驗中翻轉成為「前景」的日常生活經驗，成為地方農務工作的勞動秩序；至於看似為「前景」的遼闊稻景及風土環境，反成為日常生活和勞動經驗以及經濟秩序的背景，甚至再一次形塑了在地居民的家鄉認知，透過社區營造及農村休閒產業的推動，翻轉成為前景的觀光景觀與池上印象。於是，池上稻景的文化景觀內涵，便在上述「前景」與「後景」來回的動態交會及張力關係中展現出來，並且為地方從過去的米業到今日的觀光產業，提供了重要的社經濟脈絡訊息。

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Pierre 指出「慣習」的概念，是由外部的客觀結構所生成。而產生「慣習」的結構則藉由「慣習」支配了實踐行為，並主要透過「慣習」生成物（如思想、感知、表述、行為等，慣習生成所處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約束和限制而得。這種潛在行為傾向系統（即慣習），是外部結構藉以持續實施的內在法則，

也就是「外在性內化」。若客觀結構要持續運行，就必須藉由「慣習」來完成，並透過將其邏輯施於身體化，使行動者通過身體化的過程而從屬在制度之中，因此也是「內在性外化」。「慣習」使行動者生活在制度中，在實踐中佔有制度，也透過對制度加以修正和改變，使制度保持活力（Bourdieu, Pierre 蔣梓驊譯 2003）。

由此可理解，原先位於「後景」的客觀結構，以及屬於「前景」的遼闊稻景，透過行動者諸如農民、居民、糧商、鄉公所等勞動經驗作為一種「慣習」，產生了這兩者之間的交替與翻轉。也就是說，行動者們將位於「後景」的外部結構及其邏輯轉化為內在法則，藉由身體化與勞動的過程，進一步透過勞動地景呈現並形成「前景」，使得原先的前景元素反成為了背景。而接著，行動者們的勞動地景，亦回頭成為了制度的一部分；於是，四季更迭及農人們穿梭的池上稻景作為「前景」，然而他們形成的勞動秩序也在制度結構中佔有了位置。

這片稻景對池上這個地方來說，不只是小地方的代名詞，不僅是匯聚都市遊客及媒體農村浪漫想像的場域，更非淪為觀光發展、土地炒作以及替利益背書的工具。它是地方發展重要的象徵，更作為臺灣近代農糧政策的歷史縮影，對於地方及國內的農業發展歷程，實具有相當的歷史份量與象徵意義。然而，其所延伸的保存價值與維護行動會如何被地方理解？

由上述可知，農民的勞動經驗為「前景」與「後景」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翻轉，可見勞動者的主體性應視為地景保存與維護的重要對象。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當前各方對「文化景觀」理解差異的衝突下，若從消極層面針對景觀本身採取維護措施與研擬，恐形成更多激化與對立；或許，轉而從積極層面思考如何讓地方稻農與其制度永續經營，並且深化其文化景觀內涵與教育推廣，應視為重要的地景保存工作方向。

當年帶著生態環境維護色彩的有機農業，在落入地方及臺灣米質提升的時代土壤中，長出具有本土脈絡的精緻意涵，或許這段農業發展歷程亦提供了某種參考。也就是說，地景保存與維護的理念固然值得推動也有其必要性，然而，它會如何在地方脈絡中被解讀，如何在多方想像的角力下折衝，本文認為也是不可忽略且須同時在過程中關注的重要訊息。

## 六、參考文獻

丁文彥、黃秋蘭、江瑞拱

2008〈臺東有機米之栽培與管理〉，《臺東區農業改良廠技術專刊》13輯。臺東：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方怡潔

2003《地景、風水與儒商文化：雲南和順僑鄉的民間文化與國家象徵與實踐》。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時報

1995a, 01, 19〈稻穀分級收購，明年一期作試辦—選定中部、東部五鄉鎮所栽良質米為對象，評鑑合格者將以高於一般稻穀價格收購〉，《中國時報》，頁 07 版。

中國時報

1995c, 07, 12〈因應入關，稻米國家標準重定—未來不同等級公糧及良質米將有不同收購價格，以強化競爭力〉，《中國時報》，頁 07 版。

中國時報

2007d, 02, 05〈有機村才能救農業〉，《中國時報》，頁 A15 版。

池上鄉公所主計室

2007《臺東縣池上鄉統計要覽》，第5期。臺東：池上鄉公所。

池上鄉公所主計室

2013《臺東縣池上鄉統計要覽》，第11期。臺東：池上鄉公所。

江瑞拱

2005〈臺灣良質米栽培現況與挑戰〉，《臺灣米產銷及經營技術研討會專刊》，頁 53-65。臺北：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宋勳、許愛娜、洪梅珠

1988〈臺灣主要水稻推廣品種之品質與分級〉，《稻米品質研討會專輯》，頁 327-340。臺中：臺中區農改場。

林俊義

2005〈永續農業之理念與發展策略〉，《農業試驗所特刊：合理化施肥

專刊》121：1-14。臺北：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吳清吉

1996〈池上鄉良質米發展的歷程成果與展望〉，《臺東區農業專訊》18：16-17。臺東：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倪禮豐

2007〈日本有機農業生產技術〉，發表於公務員出國報告，計畫名稱：農業高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有機農業生產技術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主辦。出國時間：95年11月02日至95年12月01日，報告日期：96年02月27日。

張德興、楊昌隆

1996〈關山良質米的生產及展望〉，《臺東區農業專訊》18：18。臺東：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2008，09，19〈相關事業業務團體利益衝突分析報告書〉。取自：(財)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www.moa.org.tw/node/122>

陳吉村

1995〈何謂永續農業？〉，《花蓮區農業專訊》12：4-6。花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梁正賢

2005〈稻米分級與收購制度〉，《東部稻米產銷研討會專刊》，頁141-152。花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黃樹民

2013〈臺灣有機農業的發展及其限制：一個技術轉變簡史〉，《臺灣人類學刊》11(1)：9-3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伯恩

1994，〈從永續農業發展到有機農產品上市〉，《鄉間小路》20：12，頁54-55。臺北：豐年社。

黃明得

1994〈面臨GATT臺東地區的農業如何調適系列4：調整產銷結構，善用農業資源〉，《豐年》44(24)：66-68。臺北：豐年社。

黃瑞茂

2016，《104年度臺東縣文化景觀「池上萬安老田區」保存維護計畫》。臺東：臺東縣政府。

唐淑華、蕭榕瓊

2012，〈農產叩關：啟動貿易自由化與WTO〉，《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農業實紀》，頁365-368。臺北：行政院農委會。

孫清義

2005《CAS臺灣好米消費者偏好與推廣策略》。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

漢聲出版社

1996a《日本 MOA 的自然農法》。臺北：漢聲雜誌社。

1996b《有機報告 2—自然農耕》。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糧食經營科

2009，02，27，稻米產銷專業區簡介。取自：

[http://www.afa.gov.tw/peasant\\_index.asp?CatID=742](http://www.afa.gov.tw/peasant_index.asp?CatID=742)

劉志偉

2009〈國際農糧體制與臺灣的糧食依賴：戰後臺灣養豬業的歷史考察〉，《臺灣史研究》16（2）：105-16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劉志偉

2011〈國際農糧體制與國民飲食：戰後臺灣麵食的政治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7（1）：1-59。

蔡麗琴

1992〈認識 CAS 特級良質米〉，《消費者食品資訊》20：18-20。

鄭志聖

1999〈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發展：MOA 自然農法理念與作法〉，《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有機農業發展研討會專刊》41：123-130。臺中：臺中區農改場。

謝慶芳、白坤山

1993〈草屯有機米栽培法〉，《永續農業研討會專刊》32：157-160。臺中：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謝順景

2010〈臺灣一百多年來的有機農業發展之歷史回顧〉，《臺中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107：1-12。臺中：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鍾怡婷

2013《臺灣稻米品質與品味的轉變》。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羅桂美

2008《當代農村政經結構下美濃有機米產銷班的實踐與困境》。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世新大學。

聯合報

1991a，01，27〈食米也要選美—糧食局決辦「金米獎」選拔〉，《聯合報》，頁 05 版。

聯合報

1991b，03，16〈好吃好看，米的「選美」—品質外觀食味評選，每年辦兩次〉。《聯合報》，頁 05 版。

聯合報

2005c，12，07，〈有機米大賽，池上拿第一：冠軍「大地米」1.5 公斤 180 原，百貨公司超商有售〉，《聯合報》，頁 A6 版。



聯合報

2016, 3, 10, 〈『我們要生活！』伯朗大道闖停車場挨罰，農民不滿〉，  
《聯合報》。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553146-%E3%80%8C%E6%88%91%E5%80%91%E8%A6%81%E7%94%9F%E6%B4%BB%EF%BC%81%E3%80%8D%E4%BC%AF%E6%9C%97%E5%A4%A7%E9%81%93%E9%97%A2%E5%81%9C%E8%BB%8A%E5%A0%B4%E6%8C%A8%E7%BD%B0-%E8%BE%B2%E6%B0%91%E4%B8%8D%E6%BB%BF>。

顏昌晶

1999 〈戰後臺灣糧區制度之研究（1947-1983）〉，《史匯》3：73-87。

瞿海源、章英華

2002 〈臺灣外來新興宗教發展的比較分析〉，發表於臺灣新興宗教研討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2-03-29 ~ 2002-03-30。

Bourdieu, Pierre 著；蔣梓驊譯

2003 《實踐感》。南京：譯林。

Feld, Steven, Keith H. Basso

1996 Introduction. In Senses of Place. S. Feld, Keith. H. Basso, ed. Pp. 3-11.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Hirsch, Eric

1995 Introduction: Landscape —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E. Hirsch, M. O'Hanlon, ed. Pp. 1-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icescape, Quality and Culture Landscape : Intertwined Politics of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Rice Industry in Chihshang

Liu, Liang-Yu

### Abstract

In 1997, The Brown Avenue and its surrounding in Chihshang was seen for the commercial of Mr. Brown Coffee. Even more, the ricescape of Chihshang was pushed to the stage of the world by the commercial of EVA Airways in 2013. The ricescape of Chihshang show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most medias, touris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The ricescape is just like a synonym of Chihshang, even more, become an imagination of romantic and natural rural of Taiwan. This article start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aginations of ricescape and authenticity in rural. Also try to understand meanings of agriculture landscape through a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the rice industry in Chihshang.

In the 1980s, the food official unit start promoted the consumption of r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cess problem of rice food caused from the obstruction of rice export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policy of good-quality rice and the opening of internal rice free market. The 1990s, market threats caused from WTO, made 'good-quality rice' become a weapon to contend the market pressure. Organic Rice was promoted just in this period of quality pursuit in order to survive in the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Therefore, organic rice was understood in the same significance of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from 'good-quality rice'. This development of organic rice through intertwined politics of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rice, which intend to promote internal rice competitiveness, go forward with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which see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s the core in parallel.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e necessity to grasps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rice through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in Taiwan, and notice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rice industry. The process of organic rice in Chihshang just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conventionalizing organic'.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analyze the movement of rice quality upgrade and the trend of conventionalizing organic in three part. First, in the 1980-90s, when Taiwan government made concess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food-agricultural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affect show in the process of 'good-quality rice' plan in Chihshang. Second, after 2000, under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competition,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 of good-quality rice and organic rice pres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quality and system. At last, after 2000, the feature of organic rice promotion show in the period of pursuing high-quality ric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clarify the feature of intertwined politics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rice which embedded in rural society.

### Keywords:

Chihshang, ricescape, good-quality rice, organic rice, culture landscape